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戴伯力《官匪》，寻踪大国博弈下的黑旗军

编者按：东南亚地区“区域动态”栏目于2022年9月正式改版。改版后的“区域动态”将关注近年来东南亚研究领域的学术新作，主要选取领域内国际重点刊物的书评栏目、学术评论等为素材，通过主题聚焦、综合编译等方式，定期推介关于东南亚研究重要议题的学术作品。上期区域动态聚焦东南亚地区通史的写作，汇编了关于安东尼·瑞德所著《东南亚史：危险而关键的十字路口》的书评文章。在本期的区域动态中，我们将目光投向19世纪中越边境的“黑旗军（the Black Flags）”。黑旗军诞生于动荡年代，活动在边境山区。不同于传统的非政府武装，黑旗军在与中国清王朝、越南阮朝和法国殖民政权的割据对峙中扮演着类似代理人的关系。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East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历史学助理教授戴伯力（Bradley Davis）2017年出版的专著《官匪》（*Imperial Bandits: Outlaws and Rebels in the China-Vietnam Borderlands*）运用包括口传材料在内的多重史料，试图剥离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等权力与政治所赋予黑旗军的层层含义，从全球史的维度透析19世纪大国边境的政治社会生态。

我们有幸邀请到本书作者戴伯力为本篇推送写下寄语，一并附在文末，供读者参考。

美国印第安纳州迪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助理教授约书亚·赫尔（Joshua Herr）于2020年9月发布关于戴伯力所著《官匪》书评文章，全文编译如下：

2017年，戴伯力的专著《官匪》问世，向关注于非正式政治权力、叛乱及暴力议题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普通读者们提供了许多洞见。虽然戴伯力聚焦的时期是19世纪，但时至今日，中越边境依然是一方充满全球联结的奇妙空间。

2011年在河内，我经介绍认识了一位来自伦敦的越南裔人士。在本地啤酒的微醺之下，他向我吐露，他的家人于1979年离开位于越北边境的家乡，最终辗转定居在伦敦，此程是他重归故土。当他发现我会说粤语且正在从事一项关于中越边境的研究时，他向我讲述了更

多他们家的故事。他在伦敦长大，家里人在外面会说越南语和一点粤语，而在家里会说一种方言。他不知道这种方言叫什么，它既不是越南语，也不是汉语。我对他们的故事兴味盎然：一个来自中越边境的家庭，穿越了大半个地球背井离乡地逃难，操持着边境两侧都会使用的多种语言。我猜测他所说的母语方言是边境地区壮傣语支中的一种，与当今依族、岱依族、壮族所使用的语言非常相近。

《官匪》一书通过对“匪（bandits）”充满流动性和暴力性世界的关注，让我们一窥 19 世纪中越边境的社会生态，并帮助我们理解直至今日边境波动而复杂局面。作者戴伯力叙述了“黑旗军（the Black Flags）”在越南北部边境的崛起，及其与越南阮朝、法帝国和中国清王朝政府权力的对峙与缠斗。此外，作者还讨论了黑旗军对当今世界的深远影响。

黑旗军兴起于 19 世纪中叶动荡的中国西南边疆。其成员来自该地区的多个民族，他们在越南的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建立起跨境基地，通过控制鸦片贸易及海关收入并对该地区民众实施暴力恐吓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在成功控制地方政权之余，黑旗军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其先是与越南阮朝朝廷结盟，然后与中国清朝政府结盟，最著名的是在 1883-1885 年的中法战争中反抗法国对越南北部的殖民。

对于许多对当代外交事务、地缘政治、国家和非国家权力走向感兴趣的读者，以及关注越南、中国、法国殖民主义、跨国运动和十九世纪全球史的历史学家而言，本书是一部极具价值、引人入胜的读物。实际上，戴伯力笔下的“匪”与近年来国际政治的几个热门话题相通，例如 21 世纪初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雇佣兵等。书中的讨论涉及了非正式权力、暴力外包与暴力合法性，以及这些与国家权力和国家构建之间的关系。如果将黑旗军与 20 世纪湄公河三角洲的和好佛教组织（the Hoa Hao）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进行类比，或将其视作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非正式殖民（ambiguous colonization）”¹的一个案例，或将其与奥斯曼人、满清、萨法维教团（the Safavids）和西山阮氏等从权力边缘向中心转移的案例联系起来看待，那么历史学家们将会发现非常有趣的关联。

戴伯力在这本书里进行了如下几项工作：首先，他对国家与非正式权力间的关系做出了重要论述。戴伯力从霍布斯鲍姆 1969 年的经典著作《匪徒：秩序化生活的异类》（*Bandits*）延伸，从而指出，像黑旗军这样的组织并非普通的绿林好汉。相反，他们是“官匪”（imperial

¹ 详见 Brocheux, P., & Hémerly, D. (2011). *Indochina: an ambiguous colonization, 1858-1954* (Vol. 2).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作者注

bandits)，也就是说，他们是阮朝边疆政策的内在组成部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阮朝帝国统治与黑旗军之间的共生关系是他们与清朝和法国之间多方博弈的一部分。法国在 19 世纪 80 年代赢得了博弈，但实际上只是用“文明使命（the civilizing mission）”的话术掩盖了将“官匪”融入殖民政策的政治传统。

其次，戴伯力通过搜集利用关于黑旗军的口传（oral tradition）材料，质疑了许多关于黑旗军的殖民主义和反殖民民族主义叙事。他反对法国殖民者夸大黑旗军的暴力和外国渊源的叙事。与此同时，他通过对边境地区口传材料的呈现，对民族主义者的黑旗军叙事提出了批判，这些口传材料展现了血腥残忍的一面。最终，戴伯力收集的口传材料表明，黑旗军是一支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力量，根植于多民族的边境社群，并对当地社会产生了鲜明且持久的影响。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个成就是，戴伯力的著作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关于 19 世纪晚期黑旗军、阮朝帝国统治和法国殖民计划的叙述。本书文笔流畅、极富洞见，其融合性超越了既往其他只专注于上述黑旗军、阮朝和法国三个要素其中之一的著作。

以下是一些章节的重点内容：第一章对 19 世纪 60 年代黑旗军的起源进行了修正，反驳了认为黑旗军是太平天国运动一个分支的普遍说法。戴伯力认为黑旗军起源于中国的西南边疆社会，彼时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朝政权衰落，边疆出现权力真空。此外，他追踪了内陆高地和沿海地区的跨境鸦片贸易控制权与黑旗军崛起之间的密切联系。

本书的第二章指出，历史上黑旗军的形象受到法国殖民主义宣传的极大影响，更深层上是受到 19 世纪 70 年代法国对中国陆路贸易和矿业的商业规划的影响。黑旗军威胁着商贸和当地秩序的形象由法国驻河内领事的报告发展而来，并在此后不断演化，这一现象被戴伯力称为“领事视角”（consular optics）。

第三章回顾了 1883 年至 1885 年的中法战争，这场战争由法国和黑旗军在贸易上新的争端而引发。此处，戴伯力的中心论点补充了劳埃德·伊士曼（Lloyd Eastman）1967 年在《王座与官吏》（*Throne and Mandarins*）一书中对战争的研究——越南官吏在黑旗军和法国问题上的立场就像中国清廷对战争的看法一样多元且充满分歧。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章中关于黑旗军本身的内容少之又少。但戴伯力为理解这场冲突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新视角。戴伯力在叙述黑旗军与涂普义（Jean Dupuis）等法国人的同时，向我们介绍了清末官员唐景崧（Tang Jingsong）、岑毓英（Cen Yuying）和徐延旭（Xu Yanxu）

等人。唐景崧在受任于清廷期间请缨联络并支持黑旗军，岑毓英和徐延旭在 1883 年至 1885 年的中法战争中指挥清军并与黑旗军联系。此外，戴伯力搜集了上海的中文报纸《申报》、法国的都市戏剧等一系列材料，呈现了国际上对战争和黑旗军的看法。

第四章认为，尽管法国在中法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在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及之后，促使黑旗军崛起的帝国政治和边境生态并未衰减。如同之前的阮朝和清朝，法国政权试图在战争结束后同时镇压并吸收黑旗军的残余势力以及其他匪徒集团。法国人还明确并强化了清越边界，架设了电报线路，然而这些要素既易于被法国人所使用，也同样易于被边境居民所操纵。戴伯力开创性地讨论了在边境地区使用电报的问题，其中包括反清革命者和黑旗军领袖刘永福通过电报联络求援的现象，这尤其值得关注。

最后的结论实际上更像是尾声，戴伯力亲自调研了当今的边境，拆解了“固定边界”的国家主义（statist）幻想，并对跨境边民进行了采访。他的论述更具有实质意义的部分在于对中国史和越南史研究口传传统的反思。对于理解黑旗军而言，边境的语境比国家的语境更为重要，同时，历史中也一直存在着抹去和遗忘边境语境的动机。

我对于戴伯力这部极具价值之著作的主要批评是，其对于黑旗军本身的描写较少。总的来说，这本书读起来很好，特别是对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对黑旗军的叙事提供了一种反思，作者对口传材料的运用有助于对既有叙事的修正。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我对阮朝、法国和清朝与黑旗军的关系有了一个相当清晰的概念，但令人惊讶的是，这本书围绕黑旗军本身诸多问题所涉及的笔墨之少，比如黑旗军的民族构成、组织方式、黑旗军对鸦片生产和销售的控制方式、黑旗军的意识形态、黑旗军影响下的社会等。这些方面都在书中有所提及，但其细节以及更深层的因果联系并不明晰。

我自己也从事中越边境地区的研究，充分意识到要寻找解答上述问题的一手材料是相当困难的。假设寻找一手资料的困难来源于黑旗军本身资料的不足，我想，是否可以通过对法国、中国和越南阮朝的资料进行更多地寻踪？尽管它们带有偏见且零碎，但如果我们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阅读，或许能够整合出一些令人信服的信息。

鉴于黑旗军本身的属性仍相当模糊，我读完这本书后仍有这样一些问题：黑旗军渴望建立国家吗？如果他们对建立国家并无渴望的话，那又是为什么呢？黑旗军是否更类似于黑水公司（Blackwater）这样的雇佣兵？或者说到底，他们是不是只是一批机会主义者？当然，可供戴伯力的史学研究进行参照对比的有诸多有趣的案例，包括 17 世纪早期的满清、18 世

纪的越南西山王朝,以及 20 世纪早期例如和好佛教、高台教、越南南部黎文远的平川派(Binh Xuyên groups) 等半国家社群。

从帝国的角度来看,黑旗军是如何融入我们现在已知的不断扩展的帝国叙事²中的呢?我们可否把黑旗军看作是帝国的中间人,或者是一种暴力的外包商,就像财政领域的包税人一样。或许我们可以从与黑旗军较近的时段的案例中获得启发,例如中国历史上的羁縻政策或土司制度。

瑕不掩瑜,我不想让大家忽视本书的真正贡献。这部精彩的作品交织叙述了阮朝、清朝和法国交叠纷呈的帝国历史,宏大叙事中心的明珠是黑旗军在边境的崛起。如今,这部作品取代了伊士曼(Eastman)的早期著作,成为了黑旗军研究的一个标杆。这部作品将受到研究跨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亚洲问题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欢迎。此外,本书篇幅紧凑(主要内容为 170 页)、文字清晰、内容丰富,使之成为向本科生讲授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亚洲历史的一个有效而生动的案例研究。

越南的 19 世纪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其有着丰富的、尚待发掘的史料资源,是一个仍待充分研究的课题。《官匪》一书成功地捕捉到法国殖民计划的传统焦点,超越了阮朝政治、当地社会和跨国历史的研究,并且最终没有落入欧洲研究视角的窠臼。我坚信这本书将激发人们对越南历史上这个重要且有趣的世纪的进一步探索。

(英文原文见 <https://china.usc.edu/davis-imperial-bandits-outlaws-and-rebels-china-vietnam-borderlands->

2017, 编译转载已获作者授权)

《官匪》作者戴伯力寄语:

感谢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东南亚组组织了这次关于我的专著的讨论及书评翻译。在我看来,出版一部著作往往意味着允许读者去体验和解读,尤其是当作品历经了长时间的研究和写作后,读者对其解读的方式甚至可能是令作者惊讶的。作为一名读者,我一直都很

² 例如,简·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2010年出版的《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Empires in World history)》一书所提出的观点。——作者注

欣赏那些能够激发我思考的著作，即使有时我发现自己并不认同作者的分析。我希望上述对于《官匪》的书评或许能激发每位读者像这样的思考。

我谨在此对本书做一个简短的说明：正如我在致谢中所书，感谢中国和越南几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广西的黄振南教授和范宏贵教授，如果没有这两位导师，我不可能完成此项工作；越南的潘辉梨教授（Phan Huy Le）和阮光玉教授（Nguyen Quang Ngoc），他们是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典范。

（本栏目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与立场）

策划：管浩、宋天耘

编译：宋天耘

审校：东南亚组